

中國簡牘整理研究的新進展

New Development in Organizing and Studying Wooden Strips Excavated in China

WANG Su

王 素

近年來，中國簡牘的整理研究，無疑成爲出土文獻整理研究的一大熱點。這不僅因爲簡牘的發掘出土越來越密集和簡牘的盜掘出土越來越專業，還因爲簡牘的整理越來越科學化和簡牘的研究越來越國際化。下面僅就我所瞭解的情況，對中國簡牘整理研究的新進展作一簡單介紹。⁽¹⁾

1, 楚簡

楚簡主要指湖北，河南等楚國故地出土的戰國時期用楚文字書寫的竹木簡牘。這些簡牘的內容以典籍爲主，時間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班固《漢書·藝文志》很少記載，因而備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中國楚簡之熱，堪稱其來有漸。已經整理出版的楚簡主要有信陽長臺關楚簡（1957年出土），江陵望山楚簡（1965-1966年出土），隨州曾侯乙墓楚簡（1978年出土），江陵九店楚簡（1981-1989年出土），荊門包山楚簡（1987年出土），慈利石板村楚簡（1987年出土），江陵磚瓦廠楚簡（1992年出土），荊門郭店楚簡（1993年出土），新蔡葛陵楚簡（1994年出土）等。其中荊門郭店楚簡數量最多（共804枚，有字者達726枚，13000餘字），價值最大（凡有先秦儒道典籍18篇，最著名的有《緇衣》，《窮達以時》，《性自命出》，《魯穆公問子思》與《太一生水》及《老子》甲，乙，丙3篇等），曾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研究工作同時展開，迄今已發表和出版相關論著超過400篇部，影響十分深遠。⁽²⁾甚至有學者以爲：整個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文化史，都將因此而重寫。現在正在整理研究的楚簡主要有上海博物館楚簡，清華大學楚簡，浙江大學楚簡。

(1) 上海博物館楚簡

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回了一批大陸流出戰國楚文字竹簡，學術界簡稱爲“上博簡”。這批楚簡共計1200餘枚，約35000字，凡有典籍八十餘種，內容以儒家爲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及雜家等，能與傳世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足十種，價值之大可以想見。目前已整理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冊，每一冊的出版都曾引起國際學術界的轟動。譬如第一冊收《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三種，其中，《孔子詩論》與傳世的《詩論》，《緇衣》，《性情論》與郭店楚簡中的《緇衣》，《性自命出》，彼此關係和異同情況，曾引起熱烈討論。21世紀以來，國內外有關中國簡牘的研究論著，50%以上都與“上博簡”有關，可見“上博簡”的價值與意義。⁽³⁾

(2) 清華大學楚簡

2006 年冬，香港文物市場出現一批大陸流出戰國楚文字竹簡。2008 年 7 月 15 日，清華大學以校友趙偉國捐贈為名，從香港購藏了這批楚簡，學術界簡稱為“清華簡”。這批楚簡共計 2500 枚（包括殘片）左右，包括典籍 60 餘篇，內容以經，史為主，兼及子，集，故一般認為這些內容與西漢孔壁與西晉汲冢的發現有近似之處。整理者一邊整理出版，一邊刊發研究論文，一邊召開學術研討會，使“清華簡”的影響日益擴大，甚至有超過“上博簡”之勢。目前已整理出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⁴⁾二卷。譬如第一卷收有《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楚居》9 篇文獻，相關研究論文均為集中刊出，⁽⁵⁾並於 2011 年 6 月 28-29 日在北京達園賓館召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⁶⁾（壹）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卷內容雖然較為單一，主要為《繫年》，屬於西周初年至戰國前期編年史，與西晉汲冢發現的《竹書紀年》性質大致相同，但與傳世的《左傳》，《國語》，《史記》等典籍進行比較研究，也一定會有很多新發現。

(3) 浙江大學楚簡

2009 年夏，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以接受校友朱國英金蘭基金捐贈為名，購藏了一批戰國楚簡，學術界簡稱為“浙大簡”。這批楚簡均有不同程度的折斷，完整簡數量不多。清理完畢，編為 324 號；綴合復原，實得近 200 號。推測原有完整簡約 160 枚。內容包括日書二種（《玉勺》，《四日至》，共 3 枚），遺策（33 號），卜筮祭禱簡（22 號），《春秋左氏傳》（125 號 + 13 枚）等。日書二種價值尚待研究。遺策（33 號），卜筮祭禱簡數量較少，內容與已公佈的江陵望山楚簡，荊門包山楚簡，新蔡葛陵楚簡相關部分大致相同，價值也較為有限。據稱：惟《春秋左氏傳》始於襄公九年，止於襄公十年（未完），除中間缺少一段文字外，基本完整，是繼西漢孔壁出土古文《左傳》2000 年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價值與意義均非同一般。目前，“浙大簡”雖因數量不多，已全部整理出版，⁽⁷⁾但真正的研究卻似乎尚未開始。

2, 秦簡

秦簡主要指湖北，湖南，四川，甘肅等地秦墓和秦代遺址出土的戰國晚期至秦代的竹木簡牘。這些簡牘內容豐富，既有典籍，也有官私文書，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已經整理出版的秦簡主要有雲夢睡虎地秦簡（1975 年出土），青川郝家坪秦簡（1979 年出土），天水放馬灘秦簡（1986 年出土），雲夢龍崗秦簡（1989 年出土），荊州王家臺秦簡（1993 年出土），荊州周家臺秦簡（1993 年出土）等。其中雲夢睡虎地秦簡數量最多（包括殘片共 1200 餘枚），價值最大（以典籍為主，最著名的有《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為吏之道》及《編年紀》，《日書》甲，乙二種等），曾引起學術界對秦代法律研究的熱潮。現在正在整理研究的秦簡主要有龍山里耶秦簡，嶽麓書院秦簡，北京大學秦簡。

(1) 龍山里耶秦簡

2002 年，湖南龍山里耶古城一號古井出土 36000 餘枚秦簡。接着，2005 年，里耶古城北護城壕的凹坑又出土少量秦簡。學術界統稱為“里耶簡”。其中，少數為無字簡，多數為有字簡。時間從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年）至秦二世二年（前 208 年）。內容多為官府檔案，涉及當時社會政治，經濟，

文化的各個方面，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價值。發掘簡報，發掘報告及相关解释论著剛剛發表和出版⁽⁸⁾，就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07年10月17-19日，曾在湖南龍山召開“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相關論文集。目前已整理出版書法本《湖南里耶秦簡》四冊，圖文本《里耶秦簡》第一卷，校讀本《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⁹⁾。圖文本《里耶秦簡》與校讀本《里耶秦簡牘校釋》各有五卷，全部整理出版尚需時日⁽¹⁰⁾。

(2) 嶽麓書院秦簡

2007年，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回了一批大陸流出秦簡。這批秦簡殘整不一，編為2098號，其中較完整的有1300餘枚。接着，2008年，又接受香港某收藏家捐贈一批大陸流出秦簡。這批秦簡編為76號，其中較完整的有30餘枚。學術界統稱為“嶽麓簡”。整理者根據內容分為《質日》，《為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書》，《數》書，《奏讞書》，《秦律雜抄》，《秦令雜抄》七類，採用“國際研讀會”方式進行定稿。其中，《為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書》分別與前揭雲夢睡虎地簡中的《為吏之道》，《日書·夢》存在某種關聯，值得進行比較研究。目前已整理出版《嶽麓書院藏秦簡》二卷⁽¹¹⁾。該書第三卷也將於近年整理出版。同時，研究工作也已開始⁽¹²⁾。

(3) 北京大學秦簡

2010年初，北京大學接受香港馮燊均國學基金會捐贈一批大陸流出秦簡，學術界簡稱為“北大秦簡”。同年10月23日，北京大學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這一消息。據介紹：這批秦簡共700餘枚，其中300餘枚為雙面抄寫，內容包括《質日》，《田書》，《雜抄》，《制衣書》，《算數書》，《為吏之道》，《志怪小說》，《公子從軍賦》，《交通里程書》等。其中，《為吏之道》可與雲夢睡虎地簡中的《為吏之道》，“嶽麓簡”中的《為吏治官及黔首》進行比較研究。《算數書》數量最多，除列舉田畝，賦稅，糧食兌換等實際問題的演算法外，還包含了一段長達800餘字的“數論”，詳述古代數學的起源，作用和意義，是目前我國所見最早的數學理論著述。這批秦簡目前尚在整理中，離出版還有較長一段時間，研究工作似乎更未開始。

3, 漢簡

漢簡主要指新疆，內蒙，甘肅，青海，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江蘇等省，自治區漢墓和漢代遺址出土的兩漢時期的竹木簡牘。這些簡牘內容更為豐富，雖然也有典籍，但更多的是官私文書，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已經整理出版的漢簡，除了發現較早的尼雅漢簡（1906年出土），樓蘭漢簡（1930，1934年出土），敦煌邊塞漢簡（1907年出土），酒泉邊塞漢簡（1914年出土）和數量較多的居延舊漢簡（1930-1931年出土），居延新漢簡（1972-1974年出土，包括肩水金關漢簡）外，主要還有武威磨嘴子漢簡（1959年出土），長沙馬王堆漢簡（1972年出土），臨沂銀雀山漢簡（1972年出土），武威旱灘坡漢簡（1972年出土），定縣八角廊漢簡（1973年出土），江陵鳳凰山漢簡（1973，1975年出土），阜陽雙古堆漢簡（1977年出土），大通上孫家寨漢簡（1978年出土），敦煌馬圈灣漢簡（1979年出土），江陵張家山漢簡（1983-1984年出土），東海尹灣漢簡（1993年出土），額濟納漢簡（1999-2002年出土），隨州孔家坡漢簡（2000年出土），長沙東牌樓漢簡（2004年出土）等。現在正在整理研究的漢簡主要有敦煌懸泉漢簡，長沙走馬樓漢簡，天長紀莊漢簡，北京大學漢簡，長沙五一廣場漢簡。

(1) 敦煌懸泉漢簡

1990-1992 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 35000 餘枚漢簡，其中有字簡 23000 餘枚，學術界簡稱為“懸泉簡”。這批漢簡時間跨越兩漢，內容十分豐富，包括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爰書，簿籍，符傳，曆譜，術數，醫方以及一些古籍殘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其中，有關西域及中外關係的簡牘據說有 360 多枚，尤其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譬如一枚公元 1 世紀中葉，東漢明帝時期的“浮屠簡”，全文為：“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學者認為屬於出土文獻有關西域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載。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僅出版過《敦煌懸泉漢簡釋粹》，《懸泉漢簡研究》一類“選刊”性質的著作⁽¹³⁾，一直未能全部整理出版。

(2) 長沙走馬樓漢簡

2003 年，長沙走馬樓八號古井出土 3000-4000 枚漢簡，據考證應為西漢武帝時期長沙康（戴）王劉庸（前 128- 前 101 年在位）的王國文書檔案。這批漢簡主要為竹質，棱形有角，多面書寫，有可能就是當時用於“記事”的“觚”。過去出土的簡牘，木質“觚”雖然並不少見，但竹質“觚”卻似乎從未見過。內容十分豐富，官文書包括制可，律令，爰書及辭，解，令，移等，涉及的王國職官有宰相，內史，中尉，大農，太倉，丞，相，卒史，令，長，少內，嗇夫以及令史，尉史，獄史等機構的掾，屬，佐等，涉及的少數民族有胡人，巴人，賈人等。可惜的是，目前僅發表發掘簡報⁽¹⁴⁾，正式的整理研究似乎尚未開始。

(3) 天長紀莊漢簡

2004 年，天長市安樂鎮紀莊西漢東陽縣官吏謝孟墓出土 34 枚木牘。這批木牘兩面書寫，保存相對完整。內容包括戶口簿，算簿，書信，木刺，藥方，禮單等，其中，戶口簿，算簿價值最大，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可惜目前僅發表發掘簡報⁽¹⁵⁾，正式的發掘報告尚在整理中。但部分研究論文已集中刊出⁽¹⁶⁾。

(4) 北京大學漢簡

2009 年初，北京大學以接受捐贈為名，購藏了一批海外回歸的漢簡，學術界簡稱為“北大漢簡”。同年 11 月 5 日，北京大學召開情況通報暨座談會。據介紹：這批漢簡共 3346 枚，從記載“孝景元年”推測，時間大致屬於西漢中期。內容極為豐富，包括《蒼頡篇》，《趙正書》，《老子》，《周馴》，《妄稽》，《反淫》，《日書》，《堪輿》，《雨書》，《六博》，《荊決》及醫書等近二十種古代典籍，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部分介紹性文章已集中刊出⁽¹⁷⁾。正式整理工作也已開始。但離出版還有一段時間。

(5) 長沙五一廣場漢簡

2010 年，長沙地鐵 2 號線五一廣場站東南地下古井出土近萬枚漢簡，其中，竹簡情況不詳，木簡較完整的約有 2000 枚左右。這批漢簡有永元（89-104 年），延平（106 年）等年號，可以判斷是東漢前期簡牘。另外，簡牘上常見臨湘令，長沙大守等字樣，可以判斷主要為當地官府的文書檔案；又常見左賊曹，右賊曹，賊捕掾等字樣，還有一枚簽牌上寫“賊曹本”三字，可以判斷相當部分是賊曹的文書檔案。目前，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等單位雖然已經達成

合作整理意向，但正式的整理工作，由於種種原因，恐怕一時還很難展開。

4, 吳簡

吳簡過去出土不多。雖然曾有南陵麻橋吳牘（1978年出土），南昌陽明路吳簡（1979年出土），鄂城水泥廠吳簡（1980年出土），馬鞍山吳簡（1984年出土），鄂州濱湖吳簡（1993年出土）等，但由於數量都不大，且都附在發掘簡報中，沒有引起學者特別的關注。現在情況稍有不同。正在整理研究的吳簡主要有長沙走馬樓吳簡，郴州蘇仙橋吳簡，南京皇冊家園吳簡。

(1) 長沙走馬樓吳簡

1996年，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古井出土大約80000枚吳簡，其中，最早為“中平二年”（185年）竹簡（但僅1枚），最晚為嘉禾六年（237年）簡牘，可以判斷全部屬於漢末吳初簡牘，稱為三國孫吳時期簡牘也無不可。內容主要為長沙郡和臨湘縣（即臨湘侯國）的戶口簿籍，租稅帳簿及各類官府文書，可以判斷主要為當地官府的檔案。中國古代的歷史資料，三國時期特別稀少，這批吳簡的出土，自然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整理工作1998年5月就已正式開始。全書共十一卷，至今為止，已出版《嘉禾吏民田家荊》一卷，《竹簡》四卷，還有六卷，預計會在今後5年內全部整理出版。研究工作也已同時展開，迄今已發表和出版相關論著近300篇部，影響廣泛而深遠。⁽¹⁸⁾

(2) 郴州蘇仙橋吳簡

2003年，郴州蘇仙橋四號古井出土140枚（含殘片）吳簡，有赤烏二年（239年），赤烏五年（242年）和赤烏六年（243年）等紀年，可以判斷大致屬於三國孫吳前中期的簡牘。內容包括簿籍，書信，記事及習字等，習字簡提到桂陽，書信簡注明收件人為李某，因而整理者推測應為桂陽郡吏李某的私人文書。目前僅發表發掘簡報，正式的發掘報告應該還在整理中。⁽¹⁹⁾

(3) 南京皇冊家園吳簡

2004年，南京城南秦淮河南岸船板巷旁的皇冊家園建設工地出土40餘枚孫吳和西晉的簡牘。其中，孫吳見有赤烏元年（238年），赤烏十三年（250年），永安四年（261年）等紀年，西晉僅見建興三年（315年）紀年，可以判斷孫吳簡牘居多，西晉簡牘較少。形制有木簡，名刺，簽牌，符券，封檢，內容涉及米糧交納，道教符籙等，有一定的歷史研究價值。目前已有學者從書法角度對其價值進行探討。⁽²⁰⁾正式的發掘報告應該還在整理中。

5, 晉簡

西晉簡牘發現甚早，早在1901年，英國的斯坦因和瑞典的斯文赫定，就分別在尼雅和樓蘭的古代遺址發現過西晉簡牘。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在這兩個遺址也還續有出土。此外，在吐魯番阿斯塔那晉墓和前揭南京皇冊家園也出土過西晉簡牘。在江西南昌東湖晉墓，江西南昌火車站晉墓還出土過東晉簡牘。但數量都不大。最大的一批是郴州蘇仙橋十號古井出土的西晉簡牘。

2004年，郴州蘇仙橋十號古井出土909枚（含殘簡）西晉竹木簡牘（僅2枚為竹質，其餘均為木質），其中，有元康（291-299年），永康（300年），永寧（301年），太安（302-303年）等年號，可以判

斷大致屬於西晉中期的簡牘。這批簡牘屢見桂陽郡及其屬縣郴，便，晉寧，南平，耒陽之名，桂陽大守，大守五官掾，郴令等官，祠祭，符信，戶口簿籍，郵傳驛亭以及大量有關當地村的資料，可以判斷主要為當地官府的文書檔案，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獻價值。譬如：簡牘載“漢故長沙大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此處胡滕僅見《太平御覽》卷六〇六引《桂陽先賢畫贊》，但記官為南陽從事。又有《祝祖文》或《祖祝文》，這種文體似乎僅見於魏晉，僅《西晉文紀》卷一〇，《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九載有殘篇。可見這批簡牘的珍貴。目前雖然僅發表發掘簡報⁽²¹⁾，但研究工作實際早已開始。特別是日本的長沙吳簡研究會，已在東京立正大學大崎キャンパス 4 號館 41B 舉辦過兩場報告：一場在 2010 年 10 月 2 日，由菊地大氏作關於《チン州晉簡の亭・郵・馭記載簡について》的報告；一場在 2010 年 12 月 4 日，由伊藤敏雄先生作關於《チン州晉簡小考》的報告，永田拓治氏作關於《チン州晉簡にみえる左戶曹について》的報告。相信隨着正式的發掘報告的整理出版，會將郴州晉簡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本文介紹中國簡牘整理研究的新進展至此告一段落。需要說明 3 點：

(1)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特別是 21 世紀初以來，還有一些科學發掘的簡牘，由於數量不多，這裏沒有介紹。譬如棗陽九連墩楚簡（2002 年出土），日照海曲漢簡（2002 年出土），泗陽大青墩漢簡（2002 年出土），荊州岳橋及印臺漢簡（2002-2003 年出土），安西九墩灣漢簡（2003 年出土），荊州松柏漢簡（2004 年出土），廣州南越國漢簡（2004-2005 年出土），等等。這些簡牘大都已發表發掘簡報，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正式的發掘報告大都還在整理中。

(2)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特別是 21 世紀初以來，由於簡牘的學術價值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盜墓者也將注意力放在盜掘簡牘上了。盜墓者盜掘的簡牘，大都保存良好，甚至超過科學發掘的簡牘，具有很高的專業水準。但這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成爲了一個難題。21 世紀初以來，國家文物局爲了制止盜掘簡牘之風，禁止（未見明文）購買，出版盜掘的簡牘。但這條禁令僅對文博系統和文物出版社有效，對於高等院校和非文博系統的出版社沒有約束力。因此，除了此前的“上博簡”是上海博物館購買的外，此後的“清華簡”，“浙大簡”，“嶽麓簡”，“北大秦簡”，“北大漢簡”（還有尚未披露，情況不甚清楚的安徽大學新近購買的楚簡或漢簡），都是高等院校購買的，也都是非文博系統的出版社出版的或將要出版的。

(3)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特別是 21 世紀初以來，簡牘真偽之爭愈演愈烈。應該指出，所謂簡牘真偽之爭，都是由盜掘的簡牘引起的。特別是其中楚簡。大概是因爲楚文字與中原文字不同，缺乏規範，易於作偽造假。本文介紹的上博，清華，浙大三批楚簡，都存在真偽之爭。“上博簡”時間過去較久，可以不論。“清華簡”剛從海外購回進行保護時，荊州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的一批從事文物保護的專家就堅定認爲是贗品。此後，《光明日報》先後發表了 2 篇質疑文章⁽²²⁾，《中國哲學史》集中發表了 3 篇質疑論文⁽²³⁾，《學術月刊》也發表了 1 篇質疑論文⁽²⁴⁾。據我所知，還有不少質疑論文也將在近期發表。由於質疑者也並非都是泛泛之輩，這些意見自應值得重視。無獨有偶。“浙大簡”剛剛整理出版，也被學者指爲假簡。其實，很早就有學者提醒：“由於清華簡是從海外文物市場購回的，所以不應急於作‘一面倒’的造勢宣傳，而應該進行一系列縝密的鑒定，花大工夫先辨別真假，這是進一步研究

的前提。否則，一大批學者將滿腔的熱忱和半生的精力去用於研究這批竹簡，到後來證明是假簡，那時將是不堪回首和難以面對的。⁽²⁶⁾說的雖然是“清華簡”，但對所有盜掘的簡牘都適用。這是應該引起大家警惕的。

注釋

- (1)——李均明，劉國忠，劉光勝，鄔文玲著《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按：本書名為“研究”，實為介紹，且有些章節過於簡略，難以據此瞭解中國簡牘整理研究的全貌。
- (2)——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按：本書為荊門郭店楚簡的最新匯校匯釋本，將有關荊門郭店楚簡的研究成果幾乎一網打盡，利用價值較高。
- (3)——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1年。
- (4)——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中西書局，2010，2011年。
- (5)——參閱：《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3期，《文物》2011年第3期，《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4期，《出土文獻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6)——參閱：《〈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印，2011年。
- (7)——曹錦炎編著《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4-3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柴煥波《湖南龍山縣里耶戰國秦漢城址及秦代簡牘》，《考古》2003年第7期，15-19頁。
- (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
- (10)——張春龍主編《湖南里耶秦簡》全四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 (11)——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貳），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2011年。
- (12)——于洪濤《近三年嶽麓書院藏秦簡研究綜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30-36頁。
- (13)——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郝樹聲，張德芳著《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
- (14)——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組《2003年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重大考古發現》，《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7-64頁。
- (15)——紀春華，喬國榮，王震，楊以平《安徽天長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1期，4-21頁。
- (16)——參閱：《簡帛研究200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 (17)——參閱：《文物》2011年第6期。
- (18)——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同作者《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至[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08年；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 (1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J4三國吳簡》，《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52-168頁。
- (20)——賈維勇，胡舜慶，王志高《讀南京新近出土的孫吳簡牘書法割記》，《書法叢刊》2005年第3期，2-7頁。
- (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遺址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第8集，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93-117頁。
- (22)——姜廣輝《解讀清華簡：〈保訓〉十疑》，《光明日報》2009年5月4日第12版；同作者《“清華簡”鑒定可能要經歷一個長期過程—再談對〈保訓〉篇的疑問》，《光明日報》2009年6月8日第12版。
- (23)——姜廣輝《〈保訓〉疑偽新證五則》，李存山《試評清華簡〈保訓〉篇中的“陰陽”》，丁進《清華簡〈保訓〉獻疑》，《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3期，30-34，35-38，39-44頁。
- (24)——丁進《清華簡〈耆夜〉篇禮制問題述惑》，《學術月刊》2010年6月號，123-130頁。
- (25)——邢文《浙大藏簡辨偽（上）—楚簡〈左傳〉》，《光明日報》

2012年5月28日第15版；同作者《浙大藏簡辨偽（下）一戰（26）——何蘭芳《競購竹簡隱憂多》，《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期，7頁。》，《光明日報》2012年6月4日第15版。

（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協力者）
（2013年3月18日受付，2013年9月18日審査終了）

中国出土簡牘の整理・研究における新進展

New Development in Organizing and Studying Wooden Strips Excavated in China

WANG Su

王 素

葛 継勇[訳]

近年来、中国簡牘の整理・研究は、言うまでもなく出土文献研究において大きな焦点となっている。簡牘の出土数がますます増えているだけではなく、盗掘も専門化し、簡牘整理の科学化、簡牘研究の国際化がすすんでいるからである。本稿では、管見のかぎり、近年の中国簡牘整理・研究の新たな進展について簡単に紹介してみたい⁽¹⁾。

1. 楚簡

楚簡とは主に湖北省、河南省等の楚国地域から出土した、楚の文字で書かれた戦国時代の竹木簡牘を指す。内容は主に秦の始皇帝が「焚書坑儒」を行う前に流通した典籍である。これらの典籍は『漢書』の「芸文志」にあまり記録されておらず、大きな注目を浴びている。

中国楚簡研究は古くから盛んであった。これまで整理・出版された楚簡としては、主に信陽市長台関楚簡（1957年出土）、江陵望山楚簡（1965-1966年出土）、隨州市曾侯乙墓楚簡（1978年出土）、江陵九店楚簡（1981-1989年出土）、荊門市包山楚簡（1987年出土）、慈利県石板村楚簡（1987年出土）、江陵磚瓦廠楚簡（1992年出土）、荊門市郭店楚簡（1993年出土）、新蔡葛陵楚簡（1994年出土）等がある。その中でも、郭店楚簡は数が最も多く（総数804点、うち文字のある簡牘は726点、文字数は1万3000余字）、歴史価値が極めて高い（先秦時代の儒家・道家の典籍が18篇あり、『緇衣』、『窮達以時』、『性自命出』、『魯穆公問子思』、『太一生水』及び『老子』甲、乙、丙3篇などが著名である）。

現在まで、楚簡研究は非常に盛んであったといえ、発表・出版された関連論文・著作は400篇・部以上を数え、その影響も極めて大きい⁽²⁾。これらの楚簡によって、中国思想史、中国学術史、中国文化史をすべて書き直すべきだと指摘する学者もいるほどである。また現在も整理・研究中の主な楚簡としては、上海博物館の楚簡と清華大学の楚簡、浙江大学の楚簡などがある。

(1) 上海博物館の楚簡

1994年、上海博物館は香港の骨董市場に流出していた戦国秦簡を緊急保存する目的で購入した。これらの楚簡は学界で“上博簡”と呼ばれている。およそ1200余点、書かれている文字数は約3万5000字、記されている典籍は80余種類で、主な内容は儒家の典籍であるが、道家、兵家、陰陽

家及び雑家等の典籍との関係があり、一般に流通する先秦時代の古典籍と対照できるものも10種類もあるから、その価値の大きさは想像できるだろう。

また、現在、『上海博物館蔵戦国楚竹書』という著作8冊が出版されているが⁽³⁾、これは各冊が出版される度に世間の注目を集めた。例えば、第1冊に収録される典籍は『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など3種類ある。そのうち『孔子詩論』は伝世の『詩論』との関係や内容の相違点、『緇衣』、『性情論』は郭店楚簡に書かれる『緇衣』、『性自命出』との関係や内容の相違点について、様々な論議を引き起こした。21世紀に入り出版された中国簡牘の研究論著の50%以上は“上博簡”と関係があるほど、“上博簡”の価値と意義は極めて大きいのである。

(2) 清華大学の楚簡

2006年の冬、香港の骨董市場において、戦国楚簡が売りに出された。これを2008年7月15日、清華大学が買い戻したから、“清華簡”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残片を含む総数は約2500点、その内容は典籍で、60篇ある。主に経部、史部であるが、子部、集部関連のものもある。これらの楚簡は前漢の孔壁と西晋の汲冢から発見されたものと似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いる。現在、整理とともに研究論文の発表や、シンポジウムの開催なども相次いでいて、“清華簡”の影響はますます強くなりつつある。今後、“上博簡”の研究ブームを凌駕する可能性もある。

現在までのところ、『清華大学蔵戦国竹簡』2巻が出版されている。第1巻に収録された典籍は、『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楚居』の9種類である。研究論文は関係雑誌に集中して公表されており⁽⁵⁾、2011年6月28-29日に北京で開催された“清華大学蔵戦国竹簡[壹]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は関係の研究成果も報告された⁽⁶⁾。第2巻の内容は、主に『繫年』などの、西周初年から戦国前期までの編年史で、西晋の汲冢で発見された『竹書紀年』と大体同じ性格のものであるが、伝世の『左伝』、『国語』、『史記』等の典籍との比較研究が行われ、多くの新しい発見があるだろう。

(3) 浙江大学の楚簡

2009年の夏、浙江大学芸術与考古博物館は、校友の朱国英金蘭基金会によって戦国楚簡を買い戻した。これらは“浙大簡”と呼ばれている。これらの楚簡は、折られたものが多い。整理後、簡牘が324号に編目され、接合によって復元されたものが200号ある。もとの簡牘は160点であったと推測されている。

その内容は日書2種（『玉勺』、『四日至』、共に3点）、遺策（33号）、卜筮祭禱簡（22号）、『春秋左氏伝』（125号+13点）等である。日書2種の価値はまだ不明である。遺策（33号）、卜筮祭禱の簡牘は少なく、内容は江陵望山楚簡、荊門包山楚簡、新蔡葛陵楚簡の関係部分とほぼ同じで、その価値はあまり高く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春秋左氏伝』の文章は襄公9年から襄公10年（未滿）までの内容で、いくつか文字は欠けているが、基本的に完璧に残っている。これは西漢時代に孔壁から古文『左伝』が出土して以来、2000年を隔てた重大な発見であり、その価値と意義は、大変重要である。“浙大簡”の数はそれほど多くなく、既に整理・出版は終えているが⁽⁷⁾、根本的な研究は、まだ始まっていないようである。

2、秦簡

秦簡とは、主に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甘肅省等にある秦代の墓や遺址から出土した戦国晩期から秦代までの竹木簡牘を指す。これらの簡牘は内容的に豊富で、典籍もあれば、公的私的文書もあり、大変注目されている。今まで整理出版された秦簡として、雲夢県睡虎地秦簡（1975年出土）、青川県郝家坪秦簡（1979年出土）、天水市放馬灘秦簡（1986年出土）、雲夢県龍崗秦簡（1989年出土）、荆州市王家台秦簡（1993年出土）、荆州市周家台の秦簡（1993年出土）等がある。その中でも、雲夢睡虎地の秦簡は数が最も多く（残片を含む総数は1200点）、価値が特に大きい（最も著名なものは『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爲吏之道』及び『編年紀』、『日書』甲乙2種等）。これらの秦簡は、秦代法律研究のブームを促したと言われる。現在、整理・研究されつつある秦簡には、龍山県里耶の秦簡、岳麓書院の秦簡と北京大学の秦簡などがある。

(1) 龍山里耶秦簡

2002年、湖南省龍山県里耶古城の一号古井戸から秦簡が3万6000点余出土した。また、2005年、里耶古城北の内堀の凹坑から秦簡が出土した。これらの秦簡は“里耶簡”と呼ばれている。その中に、文字のある簡牘は多く、時期は秦の嬴政25年（紀元前222年）から秦の2世2年（紀元前208年）までである。内容の多くは官府檔案で、当時の社会、政治、経済、文化などの各方面に涉り、極めて貴重な歴史文献価値を持っている。発掘簡報と報告書が発表・出版されると、瞬く間に広く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⁸⁾2007年10月17日から19日まで、湖南省龍山県で“中国里耶古城・秦簡と秦文化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が開催され、関係の論文集も出版された。⁽⁹⁾現在、整理・出版された著作には、書道の『湖南里耶秦簡』4冊、図録の『里耶秦簡』第1巻、校読の『里耶秦簡牘校釈』第1巻、⁽¹⁰⁾などがある。図録『里耶秦簡』、校読『里耶秦簡牘校釈』はそれぞれ5巻を出版する予定があるが、全ての出版を終えるにはしばらく時間がかかるそうである。

(2) 岳麓書院秦簡

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書院は、香港の骨董市場に流出していた秦簡を緊急保存する目的で買い戻した。これらの秦簡は2098の番号に整理され、完形品は1300余点ある。また、2008年、香港のある収蔵家から多くの秦簡の寄贈があった。これらの秦簡は76号の番号とされ、完形品は30余点ある。岳麓書院が購入した竹簡と、収蔵家が寄贈した竹簡は、すべて“岳麓簡”と呼ばれている（形制や書体・内容などが非常に類似しており、同一の出土簡であろうと考えられている）。内容によって『質日』、『爲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書』、『数書』、『奏讞書』、『秦律雜抄』、『秦令雜抄』などの7類に分けられた。“国際研読会”が開催されて、釈読・研究がなされている。そのうち『爲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書』はそれぞれ前述の雲夢睡虎地の秦簡にある『爲吏之道』、『日書・夢』と関係があり、比較研究が進んでいる。現在、『岳麓書院藏秦簡』2巻が出版されている。⁽¹¹⁾第3巻も間もなく出版される予定である。同時に、関係の研究も始まった。⁽¹²⁾

(3) 北京大学の秦簡

2010年の初め、香港の馮燾均国学基金会によって買い戻された秦簡が北京大学に寄贈された。これらの秦簡は“北大秦簡”と呼ばれている。700点ほどあり、そのうちの約300点は表・裏の両面に文字が確認された。内容は『質日』、『田書』、『雜抄』、『制衣書』、『算数書』、『爲吏之道』、『志怪小説』、『公子従軍賦』、『交通里程書』等となっているそうである。そのうちの『爲吏之道』は、雲夢睡虎地の秦簡にある『爲吏之道』、“岳麓簡”にある『爲吏治官及黔首』との比較研究が行われている。『算数書』の数は最も多く、田畝、賦税、食糧兌換等の具体的な問題の演算法だけでなく、総文字数800余の“数論”が含まれていた。この『算数書』には古代数学の起源、働きと意義が詳しく論述されていて、これまで中国で発見された最も古い数学理論の著作と言われている。これらの秦簡は現在整理中であるから、出版まではしばらく時間がかかるそうである。

3. 漢簡

漢簡とは、主に新疆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甘肅省、青海省、湖北省、湖南省、河北省、安徽省、江蘇省等の漢代の墓や遺址から出土した両漢時代の竹木簡牘を指す。これらの簡牘は内容が極めて豊富で、典籍の簡牘もあるが、多くは公的私的文書である点で、学界の注目を広く浴びている。今まで整理出版された漢簡には、尼雅漢簡（1906年出土）、樓蘭漢簡（1930、1934年出土）、敦煌辺塞漢簡（1907年出土）、酒泉辺塞漢簡（1914年出土）と居延旧漢簡（1930-1931年出土）、居延新漢簡（1972-1974年出土、肩水金閼漢簡を含む）のほか、武威市磨嘴子漢簡（1959年出土）、長沙市馬王堆漢簡（1972年出土）、臨沂銀雀山漢簡（1972年出土）、武威市旱灘坡漢簡（1972年出土）、定県八角廊漢簡（1973年出土）、江陵鳳凰山漢簡（1973、1975年出土）、阜陽市双古堆漢簡（1977年出土）、大通県上孫家寨漢簡（1978年出土）、敦煌市馬圈湾漢簡（1979年出土）、江陵張家山漢簡（1983-1984年出土）、東海県尹湾漢簡（1993年出土）、額濟納（エチナ、エジナ）漢簡（1999-2002年出土）、隨州市孔家坡漢簡（2000年出土）、長沙市東牌楼漢簡（2004年出土）等がある。現在、整理研究中の漢簡には、敦煌市懸泉漢簡、長沙市走馬楼漢簡、天長市紀莊漢簡、北京大学漢簡、長沙五一広場漢簡などがある。

(1) 敦煌懸泉漢簡

1990年から1992年まで、敦煌懸泉置遺址から漢簡が3万5000余点出土した。その中で文字が確認できるものは2万3000余点ほどである。これらの漢簡は“懸泉簡”と呼ばれている。時代が両漢時代に涉り、内容が非常に豊富で、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爰書、簿籍、符伝、曆譜、術数、医方及び古典籍の残篇等を含んでいて、重要な研究価値を持っている。なかでも、西域と関連する内容のものが360枚あり、学界の注目を浴びている。例えば、1世紀中葉、後漢の明帝時代の“浮屠簡”には「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と書かれていた。この記載は今までの出土文献において、西域仏教が中原地区に伝わったことを記した最も古いものと言われている。残念なことに、様々な原因で、『敦煌懸泉漢簡釋粹』、『懸泉漢簡研究』などの“選集”的な性格を持つ著作が出版された⁽¹³⁾だけで、その全貌について整理・出版したものはまだない。

(2) 長沙走馬樓漢簡

2003年、長沙走馬樓八号の古井戸から出土した3000～4000点の漢簡は、前漢武帝期の、長沙王国第2代康（戴）王劉庸（前128-前101年在位）の時代の文書檔案だと推定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漢簡は主に竹で作られ、多角形のまま使用されていて、多面に文字が書かれているので、当時の“記録”用の“觚”と指摘されている。今まで出土した簡牘には、木製の“觚”があったが、竹製の“觚”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かった。これらの漢簡は内容が極めて豊富で、制可、律令、爰書及び辞、解、令、移等の多種類の公文書がある。書かれた王国の官職は宰相、内史、中尉、大農、太倉、丞、相、卒史、令、長、少内、畜夫及び掾、属、佐等があり、少数民族出身者には胡人、巴人、賈人等がいる。残念なことに、ただ発掘簡報が出版されただけで、⁽¹⁴⁾ 正式な整理・研究作業はまだ進んでいないようである。

(3) 天長紀莊漢簡

2004年、天長市安樂鎮紀莊にある前漢東陽県官吏謝孟の墓から木牘が34点出土した。これらの木牘は両面に文字が書かれていて、ほぼ完璧に保存されている。内容は戸籍簿、算簿、手紙、名刺、薬方、礼品目録等があり、なかでも戸籍簿、算簿の価値が一番大きく、大変注目されている。関連の研究論文は『簡帛研究2009』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ただし、⁽¹⁵⁾ 発掘簡報が公表されたものの、⁽¹⁶⁾ 正式な発掘報告書はまだ整理中である。関係の研究は関係雑誌に集中刊行されている。

(4) 北京大学漢簡

2009年の初め、北京大学は、海外に流通していた漢簡の寄贈をうけ、同年11月5日に公表した。これらの漢簡は“北大漢簡”と呼ばれている。当時の説明によると、すべて3346点あり、“孝景元年”の記載からみると、時代は大よそ前漢中期と推測されている。内容は極めて豊富で、『蒼頡篇』、『趙正書』、『老子』、『周馴』、『妄稽』、『反淫』、『日書』、『堪輿』、『雨書』、『六博』、『荊決』及び医書等の古代典籍が20種類あり、重要な学術的価値を持っている。これらを紹介したものは⁽¹⁷⁾ 公刊されている。正式な整理作業も始まっているが、出版までには時間がかかるそうである。

(5) 長沙五一広場漢簡

2010年、長沙地下鉄2号線の五一広場駅工事現場の東南に位置する古井戸から漢簡約1万点が出土した。このうち、保存状態の良いものは2000点ほどある。これらの漢簡は永元（89-104年）、延平（106年）等の年号があるから、後漢前期の簡牘と推測されている。臨湘令、長沙大守等の官職名から、半分以上は当地官府の文書檔案であることも判明した。また、左賊曹、右賊曹、賊捕掾等の官職名が多く見られ、“賊曹本”と記された付箋木簡もあるから、賊曹の文書檔案であることもわかった。現在、整理の必要性が認識されてはいるが、正式な作業は、さまざまな原因で、まだ始まっていない。

4. 呉簡

これまで、呉簡はほとんど出土していなかった。南陵県麻橋呉牘（1978年出土）、南昌市陽明路

呉簡（1979年出土）、鄂城区水泥工廠呉簡（1980年出土）、馬鞍山呉簡（1984年出土）、鄂州濱湖^{ビンフ}呉簡（1993年出土）等はあったが、点数が少なく、発掘簡報に掲載されるに過ぎなかったから、注目されることもあまりなかった。ところが最近、呉簡への関心が急速に高まっている。こうした契機ともなる、近年整理研究が行われた呉簡は主に長沙市走馬楼呉簡、^{ちんしゅうし}郴州市蘇仙橋呉簡と南京市皇冊家園呉簡^{こうさくかえん}である。

(1) 長沙走馬楼呉簡

1996年、長沙走馬楼二十二号古井戸から約8万点の呉簡が出土した。その中で、最も古いものは“中平2年”（185年）の竹簡（1点だけ）、最も新しいものは嘉禾6年（237年）の簡牘であることから、漢末呉初の簡牘と判明した。これらの簡牘は、孫呉時期の簡牘とも呼ばれている。内容は主に長沙郡と臨湘県（即ち臨湘侯国）の戸籍簿、租税帳簿及び官府の文書で、ほとんどが当地官府の文書檔案である。中国古代の歴史資料、なかでも三国時期の史料は極めて限られていたことから、これら呉簡の出土は、大変重視されている。整理作業は1998年5月に始まり、現在まで『長沙走馬楼三国呉簡・嘉禾吏民田家荊』1巻、『長沙走馬楼三国呉簡・竹簡』4巻などが出版された。⁽¹⁸⁾全10巻の残り6巻は今後5年以内に整理・出版される予定である。研究も進展していて、これまでに発表・出版された関連論著は約300篇（部）あり、影響もかなり強い。

(2) 郴州蘇仙橋呉簡

2003年、郴州市蘇仙橋四号の古井戸から呉簡140点（残片を含む）が出土した。その中に、赤^{せき}鳥^う2年（239年）、赤鳥5年（242年）や赤鳥6年（243年）等の紀年が書かれたものがあったことから、三国孫呉の前中期の簡牘と判明した。主に簿籍、手紙、記録及び習書等の簡牘であるが、そのなかの習書簡牘には“桂陽”の2字が確認され、手紙の簡牘には宛名李某と見えるから、桂陽郡吏李某の私文書と考えられている。現在、発掘簡報が公表されているが、⁽¹⁹⁾正式な発掘報告書はまだ刊行されていない。

(3) 南京皇冊家園呉簡

2004年、南京城南の秦淮河南岸の船板巷のそばにある皇冊家園の建築現場から孫呉・西晋の簡牘40余点が出土した。その中の孫呉の簡牘には、赤鳥元年（238年）、赤鳥13年（250年）、永安4年（261年）等の紀年が認められ、西晋の簡牘には建興3年（315年）の紀年号が認められる。また、孫呉の簡牘の方が多く、西晋の簡牘は少ないそうである。その形態は名刺、簽牌、符券、封檢の簡牘などで、食糧の交納、道教符籙等の内容のものもあり、歴史研究の価値は高いと言われる。現在、書道の角度から検討されているが、⁽²⁰⁾正式な発掘報告書はまだ出版されていない。

5. 晋簡

西晋簡牘の発見は極めて古く、1901年、イギリスのスタイン【Mark Aurel Stein】（1862～1943）とスイスのヘディン【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がそれぞれ尼雅と楼蘭の古代遺址で西晋簡牘を見つけた。その後もしばらく、この2つの遺址からは簡牘が次々と出土した。その

ほか、吐魯番市^{アスターナ}阿斯塔那の晋墓と前述の南京市皇冊家園の建築現場からも西晋簡牘が出土した。また、江西省南昌市東湖の晋墓、南昌市駅の晋墓から東晋簡牘も出土したことがある。しかし、数は少ない。その中で点数が最も多いのは郴州市蘇仙橋の西晋簡牘である。

2004年、郴州市蘇仙橋十号古井戸から西晋簡牘が909余点出土した（竹簡は2枚しかなく、ほかは木製）。その中に、元康（291-299年）、永康（300年）、永寧（301年）、太安（302-303年）等の年号が書かれたものがある。こうしたことから、西晋中期の簡牘と判明した。これらの簡牘には桂陽郡及び郴、便、晋寧、南平、耒陽などの県名があり、桂陽太守、太守五官掾、郴令等の官名も見られる。また、祠祭、符信、戸籍簿、郵伝驛亭及び大量の村の資料があるから、ほとんどが当地官府の文書檔案と推測され、その歴史的価値は極めて高い。例えば、ある簡牘には“漢故長沙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が書かれている。この「胡滕」という人物は『太平御覽』巻606の引く『桂陽先賢畫贊』に見えるのみで、官職も南陽從事と記されているだけである。また、『祝祖文』（或いは『祝祖文』）の文体は魏晋時代にしか見えず、『西晋文紀』巻10、『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巻39など2カ所だけ、残篇が残っている。こうしたことからこれらの簡牘の貴重さが分かる。これまで発掘簡報が公表されて⁽²¹⁾おり、研究作業も始まっている。特に日本の長沙呉簡研究会は立正大学大崎キャンパスで2回報告会を行ったそうである。第1回は2010年10月2日に菊地大氏が「郴州晋簡の亭・郵・駅記載簡について」というテーマで、第2回は伊藤敏雄氏が「郴州晋簡小考」、永田拓治氏が「郴州晋簡にみえる左戸曹について」というテーマで報告した。正式な発掘報告の整理出版に伴い、郴州晋簡の研究は必ずや新しい高潮を迎えるであろう。

以上で中国簡牘整理研究の新しい進展に関する紹介を終えるが、次の3点の説明を付け加えておきたい。

(1) 1980年代以後のもの、特に21世紀初頭のは、科学的な発掘成果にもとづく簡牘の数が少ないことから、ここで省略したものがある。例えば、棗陽市九連墩楚簡（2002年出土）、日照市海曲漢簡（2002年出土）、泗陽県大青墩漢簡（2002年出土）、荊州市岳橋・印台漢簡（2002-2003年出土）、安西県九墩湾漢簡（2003年出土）、荊州市松柏漢簡（2004年出土）、広州市南越国漢簡（2004-2005年出土）等の簡牘については、発掘簡報や関連の研究成果は公表されているものの、正式な発掘報告書がまだ出版されていない。

(2) 20世紀の80年代以降、特に21世紀初頭以来、簡牘の学術価値がますます重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と、簡牘の盗掘が起こるようになった。盗掘された簡牘のほとんどは、科学的に発掘されたもの以上によく保存されているように、盗掘者の技術水準も極めて高い。こうしたことから、簡牘の盗掘は中国政府にとっても深刻な問題となっている。21世紀初頭以来、中国国家文物局は簡牘盗掘ブームを途絶させるために、博物館が盗掘された簡牘を購入することを禁止している（禁止の通知が見え）。しかし、この禁令は大学などの高等学府向けではない。したがって前述の上海博物館が購入した“上博簡”以外は、“清華簡”、“浙大秦簡”、“岳麓簡”、“北大秦簡”、“北大漢簡”（まだ公開されていなく、詳細がはっきりしない安徽大学の新しく購入した楚簡または漢簡がある）など、

全て大学などの高等学府によって購入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また、文物局管轄外の出版社で出版される予定もある。

(3) 20世紀の80年代以降、特に21世紀初頭以来、簡牘の真偽についての論争はますます激しくなっていく。これらの真偽論争は、盗掘された簡牘をめぐって起こった。特に、楚簡である。楚文字は中原地区の文字と違い、基準がないから、偽りやすい。上述の上海博物館、清華大学、浙江大学の楚簡は、真偽の問題が存在している。上海博物館の楚簡は古くに購入され、ここで論じないが、清華大学が購入した楚簡は保存処理を行う際、荊州博物館や故宮博物館の文物保護の専門家が偽物と断定した。その後、同様に偽物とする論文が『光明日報』に2篇⁽²²⁾、『中国哲学史』に3篇⁽²³⁾、『学術月刊』に1篇⁽²⁴⁾刊行された。さらに、同じ主旨の論文が発表される予定がある。これらの論文を提出する研究者も簡牘の専門家であるから、彼らの意見は重視されるべきであろう。また、浙江大学の楚簡も整理・出版の直後、偽物との指摘⁽²⁵⁾が出された。

「清華大学の楚簡は海外文物市場から購入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真剣に検討し、真偽を鑑定することは、深く研究を着手するための前提となる。そうでなければ、研究者の情熱的な研究意欲と半生の精力を尽くして研究しても、もし最後にこれらが偽物だと判定されたならば、彼らは過去を振り返るに忍びなく、直面し難い問題を抱え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と指摘している人がいる⁽²⁶⁾。この指摘は、清華大学の簡牘についてであるが、盗掘され海外から購入された全ての簡牘にもあてはまるものと思う。これは、研究者にとって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ころである。

註

(1)——李均明、劉国忠、劉光勝、鄔文玲著『当代中国簡帛学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なお、書名には「研究」とあるが、実際は紹介したものである。また、いくつかの章節は簡略化しすぎているので、ここから中国簡牘整理研究の全貌は把握しにくいと思われる。

(2)——武漢大学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戦国簡冊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本書は、荊門郭店楚簡についての最新の校釈本であり、ほぼ荊門郭店楚簡についてのすべての研究成果を網羅しており、利用価値は高い。

(3)——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戦国楚竹書』(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1年。

(4)——李学勤主編『清華大学藏戦国竹簡』(壹)、(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書局、2010、2011年。

(5)——『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文物』2011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清華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4期、『出土文献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などを参照されたい。

(6)——『清華大学藏戦国竹簡』(壹) 国際学術研討会

会議論文集(清華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護中心編印、2011年)を参照されたい。

(7)——曹錦炎編著『浙江大学藏戦国楚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処、龍山県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戦国—秦代古城一号井発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4-3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発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柴煥波「湖南龍山県里耶戦国秦漢城址及秦代簡牘」、『考古』2003年第7期、15-19頁。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歴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古城・秦簡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簡与秦文化国際学術研討会論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0)——張春龍主編『湖南里耶秦簡』全4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釈』第1卷、武漢:武漢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壹)、(貳)、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0, 2011年。

(12)——于洪濤「近三年岳麓書院藏秦簡研究綜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30-36頁。

(13)——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郝樹聲,張德芳著『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

(14)——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組「2003年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重大考古發現」,『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7-64頁。

(15)——紀春華,喬國榮,王震,楊以平「安徽天長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1期,4-21頁。

(16)——『簡帛研究200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を参照されたい。

(17)——『文物』2011年第6期を参照されたい。

(18)——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同『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08年;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1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

州蘇仙橋J4 三國吳簡」,『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52-168頁。

(20)——賈維勇,胡舜慶,王志高「讀南京新出土的孫吳簡牘書法割記」,『書法叢刊』2005年第3期,2-7頁。

(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遺址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第8集,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93-117頁。

(22)——姜廣輝「解讀清華簡:〈保訓〉十疑」,『光明日報』2009年5月4日第12版;同「“清華簡”鑑定可能要經歷一個長期過程—再談對〈保訓〉篇的疑問」,『光明日報』2009年6月8日第12版。

(23)——姜廣輝『〈保訓〉疑偽新証五則』(『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3期,30-34頁),李存山『試評清華簡〈保訓〉篇中的“陰陽”』(『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3期,35-38頁),丁進「清華簡〈保訓〉獻疑」(『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3期,39-44頁)。

(24)——丁進「清華簡〈耆夜〉篇禮制問題述惑」,『學術月刊』2010年6月號,123-130頁。

(25)——邢文「浙大藏簡辨偽(上)—楚簡『左伝』」,『光明日報』2012年5月28日第15版;同「浙大藏簡辨偽(下)—戰國書法」,『光明日報』2012年6月4日第15版。

(26)——何蘭芳「競購竹簡隱憂多」,『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第1期,7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協力者)

(2013年3月18日受付,2013年9月18日審査終了)